

The popularization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lso discusses the tendency of elitism in the current Marxist research

Xingfu Gong

Wensu County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ksu, Xinjiang, 843100, China

Abstract

Popularization is an inherent aspect of Marxism, yet it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the channel of elitism: initially, cultural elites were the main disseminators, using forms of elite culture such as classical Chinese and private notes for communication, which then merged with traditional feudal political thought within the same elite cultural sphere. First, it was the feudal bureaucrats and officials of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followed by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then the petty bourgeoisie and intellectuals, and finally, the working people joined in, gradually achieving popularization through the “downward journey” of communicators. Currently, Marxist studies exhibit a tendency towards elitism that runs counter to this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and accurately grasp Marxism, unify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faith i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correct this tendency by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reality, the times, the masses, and actual experience.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trend;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过程中的大众化趋势——兼论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精英化倾向

宫兴福

中共温宿县委党校, 中国·新疆阿克苏 843100

摘 要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之意, 但后者却通过精英化通道传入中国: 先是以文化精英为传播主体, 采取如文言文、私人笔记等精英文化形式为传播形式, 在传播中与同属精英文化的传统封建政治思想融合。先是封建官僚、洋务派官员, 接着是改良主义知识分子, 再接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最后与劳动人民结合, 通过传播者的“一路下行”逐渐实现大众化。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与之“逆向而行”的精英化倾向, 需要通过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 将科学认知和信仰在实践活动中统一, 以实践结合为原则方法, 结合现实、结合时代、结合大众、结合实践纠正这种倾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 大众化趋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1 引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 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 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①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之意, 在谈到自己创立的学说时, 恩格斯曾专门指出, 那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学说^②”,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非精英化特质。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 学界有一种与之“逆向而行”的精英化倾向, 使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信仰、脱离实践, 回顾这一段对精英化特质祛除过程或能为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提供些许思路。

2 马克思主义通过精英化的通道传入中国

近代中国一批远游西方的文化精英, 最初是这些文化精英中的官僚阶层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主体, 这使马克思主义在初传入中国时带有明显的精英化特质。当然, 这种精英化特质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结果, 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够充分的体现。

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进行传播的精英阶层对马克思主义并非认同与服膺, 对传播不具有目的性与自觉性, 只是在无意识中充当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王韬

【作者简介】宫兴福, (1986—), 男, 中国甘肃会宁人, 本科, 高级讲师, 从事党史党建和基础理论研究。

是改良主义精英知识分子，他主张“变法自强”，反对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他的一生主要依靠外国资产阶级庇护，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具有明显的买办色彩。^③他曾编撰14卷本的《普法战纪》，最早介绍巴黎公社运动相关情况，使中国知识分子间接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公社的斗争被介绍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起到了先导作用^④”。但是必须得承认，卒于1897年的王韬直到逝世一直都信奉改良主义，主张君主立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不自觉的。几乎同一时期的洋务派官员李凤苞与翻译《西国近事汇编》的江南制造局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是如此。

其次，通过这些精英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碎片化的、间接的，甚至是经过曲解的。这时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是对西方相关著述的翻译及带有私人性质的日记与回忆录，它们对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零星介绍。李凤苞被革职后不再着意官场之事，或者翻译，或者著述，成《陆战新义》《海战新义》《布国兵船操练》《铁甲船程式》《使德日记》《闻政汇编》等著述。在《使德日记》中，他花费一定笔墨介绍欧洲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状况，在面对大量的外语词汇时他采用了音译的方法，把“共产主义”译为“廓密尼士”，把“社会主义”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等^⑤。尽管已经涉及到相关概念，但这些概念仍属于间接介绍，李凤苞从1878年7月始为出使德国大臣，《使德日记》所记录当在此之后，再向前追溯，他1877年率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起程赴欧，办理留学生入学事宜，此时距巴黎公社运动已经六七年之久，此时这一历史事件影响已趋消弭，而工人运动也陷入低谷。由此可知，《使德日记》对马克思主义记录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甚至说曲解误读在所难免。

最后，这些传播成果与同属精英文化的传统封建政治思想实现融合。这些被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与大众结合，更没能为劳动群众所了解，恰恰相反，反而与代表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统封建政治思想结合。《西国近事汇编》曾经试着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它将社会主义译成“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使人将社会主义混同于《礼记》中的“大同”思想。很明显，这是不利于中国人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诸多观点的。

尽管通过精英化的通道传入中国使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精英化色彩，甚至面临着被改造成为攻击劳动人民反抗的反动思想的危险，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继续深入，随着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由间接转向直接，逐渐全面准确，这一学说将会“一路下行”，实现大众化，与劳动群众实现结合。

3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主体“一路下行”的大众化道路

这里的主体“一路下行”或许不够贴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先是封建官僚、洋务派官员，接着是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再接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与劳动人民结

合，从社会结构上来看，这确实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一路下行”的传播过程，从发展历程上来看，这又与中国人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同路而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有明显的中国近代奋斗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痕迹。但是必须要承认，没有这“一路下行”过程，马克思主义难以超越精英化，实现与劳动群众结合。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是封建官僚、洋务派官员以及持改良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正如前文所述，王韬编撰14卷本《普法战纪》最早介绍了巴黎公社运动有关情况，间接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李凤苞本是洋务派官员，中国早期的外交家，在其日记及回忆录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巴黎公社运动。

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属于政治文化精英大量接触西方思想，这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下行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了马克思，“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认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咯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人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⑥这里梁启超对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准确把握，几乎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上海广学会翻译了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李提摩太部分翻译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其中也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译的《大同学》，后广学会又出版《大同学》单行本，这些翻译初步涉及马克思观点，并不乏褒奖之词，这些褒奖之词系根据原文而发，译者并没有隐瞒与歪曲。

从传播手段与对象来看，《使德日记》是封建官员罢官之后的私人性质文本，传播性极差，《西国近事汇编》类似于现在官方“内刊”或秘密文件之类，只印送给清廷在上海的有关官绅，供其阅读，具有一定的保密性^⑦，还有日记、回忆录、私人信件之类也是如此，这些形式由于传播手段与对象的限制，传播范围与影响十分有限。而维新派有创学会、办杂志、翻译出版外国书籍的传统，他们通过学生、报刊杂志、书籍的形式传播所介绍的学说，影响力远远大于前一时期。

不难看出，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路下行”传播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革命派，无意识地传播已经变成自觉地传播，忽视、排斥与误解已经变成了注意、认同与理解，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主张与中国具体情况相参照。尽管由于传播者的阶级局限，由于没有完整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由于没能把马克思主义与诸多社会主义思潮明确区分，由于用传统封建政治思想去解读马克思主义，这种参照的结果往往导致错误。

4 超越精英化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

么说,十月革命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大众化进程。不管是革命目标还是依靠力量,抑或是具体政策方面,十月革命均超越了精英化。陈独秀曾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已经是“劳动者的国家^⑧”。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与俄国布尔什维克深入农村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有密切联系。通过对俄国革命胜利原因的研究,会有越来越多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造中国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从三个方面与精英化分道扬镳,一是由于没有诸多资产阶级思想的遮蔽,这些传播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与诸多方法,对于其中最重要的诸如群众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政党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等都有准确的把握;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甚至理论研究,开始结合中国实际,尤其是结合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不仅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思想学说来研究,更是将其当作一个改造中国的方案来对待;三是不仅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还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先进知识分子成立学会、创办报刊研究、宣传俄国革命,甚至还有不少先进青年求学俄国。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⑨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超越精英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汇集的不是像封建官僚、洋务派官员、改良主义知识分子那样的政治精英,而是走向劳苦大众的思想精英与先进分子,他们不像资产阶级各种精英那样将自己置身之外,以启蒙者、领导者的身份面对劳苦大众,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劳苦大众之中,置身于劳苦大众所进行的斗争之中,立场逐渐由“一致”转向“同一”的劳苦大众先进分子。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超越精英化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纯学术化”,将其看作一种社会主张,一种思想信仰,一种崇高理想,将其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紧密结合;二是将其看作一种方法与武器,努力实现这种方法武器与平民大众相结合,拒绝将其当作供精英们消遣娱乐的纯粹学术研究,甚至是文字游戏,或者点缀自己的装饰;三是将其看作一个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赋予自身生命力,进而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开放的思想体系,而不是远现实、远离实践、远离平民的、类似于宗教教义的东西,以此马克思主义沿着具体化、实践化、大众化的方向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5 结语

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精英化倾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过程中的精英化特质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或者未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核心精髓,通过自己的研究误解歪曲马克思主义;或者未能在理论研究中体现出一定的理论认同与思想服膺,只是以非马克思主义

立场与方法进行研究阐发,未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或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自觉自信,试图用其他哲学思想的、大多是主观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误解误读;或者采用错误的具体研究方法,使自己的研究趋向“蒙昧化”、经学化与学院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之前,马克思主义通过“一路下行”的传播逐渐祛除这种精英化特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正是通过结合现实、结合时代、结合大众、结合实践的方法逐渐超越精英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要从中借鉴有效的思路与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57页。

③刘建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④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⑤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⑥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至50页。

⑦洋务官僚是《西国近事汇编》的最早读者,它刊印成册后,先送30-50本给上海及各省官员,其余由格致书室和美华书馆等办理发行。一些关心时事、热衷新学的官绅文士多购存该刊,上海、烟台、厦门的公书院也有购藏。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3年夏;乐正,郑翔贵:《近世中国人看亚洲的一个窗口——〈西国近事汇编〉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⑧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76页。

参考文献

- [1] 李欣,刘佳丽,张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阈下开放教育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J].内蒙古电大学刊,2022(06):81-86.
- [2] 泓峻,刘立山.“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以阳翰笙的两篇文章为切入点[J].上海文化,2022(02):5-13.
- [3] 成超.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路径探索——评《雄关漫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J].领导科学,2022(02):160.
- [4] 邓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实践历程及基本经验[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21,19(04):2-7.